

汽水幾許過百年？

過來人



近日在超級市場和便利店都見到一套四支的復刻版懷舊樽裝可口可樂出售，索價要50大元，

說貴不貴，但若以其實際容量而言，則肯定比現代版的可口可樂要貴，不過，筆者相信購買者都不會着眼於樽內的飲料多寡或者味道如何，而是原封不動地收藏起來，因為儘管是復刻板，但其年份也超過一世紀，所以多多少少也有一定的收藏價值。

這套懷舊可口可樂經過廠方精心挑選，年份包括最古老的1899年版，容量是285毫升，隨後的分別是1900年版，容量是255毫升；1905年版，容量是230毫升和1913年版，容量是255毫升。從以上數字可見，當年的樽裝可口可樂包裝尚未定形，14年間已經四度更改包裝，試圖在消費者的心目中取得最大公約數，但看來這四度改款尚未達到目的，因為今日流行的「葫蘆樽」仍未面世，廠方還有新一波的復刻板市場策略，可樂迷要加倍留意了。

提起汽水，其實可口可樂算得上歷史悠久了，因為不少筆者童年時經常見到的汽水品牌，隨着歲月流逝，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例如由淘化大同生產的

綠寶橙汁汽水，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港人心目中佔有很高地位，特別是廣告中那句「我想飲綠寶」更是街知巷聞，成為港產貨品的代表作，但隨着罐裝和紙包裝飲品的面世和普及，堅持以樽裝銷售的綠寶橙汁就因為攜帶不便而逐漸失去市場，最終默然引退，實在教人感到唏噓。此外，在六七十年代有一來自廣州的「珠江牌」汽水也大受港人歡迎，它有「白檸」、「白雲」和「橙汁」三種口味，原因並非它的味道特別好，而是它毋須按樽，最適合野餐旅行，在未有包裝和罐裝飲品之前，的確為港人提供了很大方便。不過，在七十年代亦抵受不過飲品包裝革命的衝擊，最終也要退出市場，只能成為歷史記憶。



▲可口可樂推出的四款復刻板懷舊樽裝，都有過百年歷史 作者供圖

世界杯的記憶

鍾林芝



我並不算得上是一個球迷，但關於世界杯的記憶卻不少。小時候，我爸愛看世界杯，我也跟着看但並沒有看出個所以然。開始對世界杯感興趣，是因為上高一時候班上有幾個特別喜歡足球的女孩，組了個球隊，體育一直不錯的我也被她們拉着入夥了。下課了聽她們講怎麼踢，怎麼配合，各人的位置，跟着也就開始看球賽了。現在想來，九七年正是中國女足如日中天的時候，我們都是受此影響開始喜歡世界杯的吧。

九八年法國世界杯是我看的第一屆世界杯，身着藍色隊服的高盧雄雞，紅藍格子的蘇克（港譯：蘇加），前插速度極快的歐文（港譯：奧雲），神奇右腳的貝克漢姆（港譯：碧咸），外星人羅納爾多（港譯：朗拿度），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一年，高盧雄雞唱霸天下，生命之杯響徹寰宇，誰還能不被這股熱潮所影響呢？

如今，我們已然從一九九八年來到二〇一八年，彈指一揮二十年，人生苦短，並沒有幾個二十年，但之於世界杯而言，不過區區六屆。印象最深的一屆世界杯是二〇〇二年韓日世界杯，不僅僅是因為中國隊第一次進入世界杯決賽圈，喜歡的巴西隊最終獲得了大力神杯。還因為那年的我正值青春年少，還能享受一群人喝酒看球的時光。

是啊，有時候我們迷世界杯，迷的何嘗不是那些與老友相聚的熱血時光呢？我們總說看球，其實是看人。試想，若沒有貝利（港譯：比利），馬拉多納

（港譯：馬勒當拿），齊達內（港譯：施丹），羅納爾迪尼奧（港譯：朗拿甸奴），貝克漢姆，梅西（港譯：美斯），C羅（港譯：C朗）等傳奇球員，這一屆屆世界杯，成個什麼樣子？煙火世界杯，四年一輪迴。四年中，為生活奔波，看人世變幻；四年又四年，依舊押寶打賭，亂猜名次，依舊在西西弗斯的遊戲中樂此不疲，卻不知老之將至。一隻小小足球，成了人生熱鬧與虛無的註解。

昨晚，用手機下單，幾根鴨脖，兩罐啤酒，窗外是凌晨三點的夜色，熒幕上是C羅大玩帽子戲法，然而看球的只剩下我和常伴左右的先生二人。時間才是真正的魔術師，它撲滅了過去的歲月，又將無法復燃的火種，深埋在每個人的記憶中。古龍說，我愛的不是酒，而是一起喝酒的朋友。世界杯之於我，又何嘗不是如此？我愛那些一起看球的朋友，愛那些一起踢球的朋友，但如今，我們早已各自成家，人各一方，散落天涯，最多也不過是通過微信聯繫來維持關係罷了。

關於世界杯的記憶，總是熱血沸騰且帶些青春無畏的。有時我也會在想，我愛世界杯或許真正愛的只是逝去的時間。買過兩套球衣，一套是尤文圖斯隊（港譯：祖雲達斯隊）黑白條紋，一套是橙色曼聯。那時覺得驕傲無比，現在，它們都找不到了。迷過一部動畫片，叫《足球小將》，如今已不想再看。曾經在校園的足球場上也英姿颯爽地歡呼奔跑着，如今卻再也找不齊當時組隊的娘子軍了……時間，就是這樣，讓我們歡笑着，把青春記憶和熱血沸騰都留在了昨天。世界杯的記憶，始終，是關於一群人的記憶。



►每屆世界杯都能引起人們的熱切討論 作者供圖



南京有座中華門，以中華命名的門，其門楣還是曾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親手題寫的，全中國僅此一道。中華門有三道甕城，北京城內城九門，外城七門，門門有城樓，門門有甕城，卻從來沒見哪道內城城門，哪座外城城門有三道甕城。中華門有三道甕城，四道券門貫通，讓人瞠目結舌和足讓「門史」添彩的是每道券門上都裝有上下可以啓動的「千斤閘」和雙扇木門，遇有敵兵攻入甕城，城內「千斤閘」門由天而降，關閉斷其歸路，伏兵由伏兵洞中殺出，其勢如關門打狗，甕中捉鯢。首道城門的主券門，縱深竟達五十八米，寬六點八米，兩邊均有七寸厚包鐵皮的太鐵門，太鐵門一關，地道都無門，敵軍必亡。

中國第一座「國門」是戰國時期趙襄子在趙地北疆所建，即現在張家口以北，張北縣。趙襄子在此處修建一座雄偉厚重大氣磅礴的「國門」——「無窮之門」，其源於《莊子·在宥》篇：「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趙襄子是位開天闢地的人物。再未見其他諸侯國包括秦國有此手筆繪國門。趙襄子在國家建設上是開拓者。

國與國之間的邊界漫長，因此國界是以線稱之，而口岸是以國門稱之，進出邊界必走國門，不入國門不可入國界。我曾在內蒙二連浩特國門處參觀，曾一腳門裏，一腳門外地站在國門之處，體驗一腳國內一腳國外的感覺，那門就是國門啊！



今年春節過後一個拜年的日子，老同事陳越打來電話：「我們去羅校長家拜年，你一起去嗎？」「當然！這等愉快的機會，一定要抓住！」我趕忙回應。

陳越來了，燕來了，郭生來了，文峰來了。多年未見的老同事，借此機會見見面，熟悉的感覺一下子恢復到從前。他們還是老樣子，沒怎麼變，挺好！

羅慶琮校長，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是香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做過前線教師、教育研究人員、教育界政府高官。他一生從事教育事業，對教育工作的評論倍受推崇。從政府退休後，羅博士任職培僑書院的創校校長，其間，我們先後是他的下屬。羅校長退休了，但是他沒有停下來，現在是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會長，一天到晚忙着，那是一份義工工作，憑熱情，純付出。

快到了，那是屯門地區。汽車沿曲曲彎彎的小路，停在一棟獨立的花園別墅前。羅校長歡歡喜喜地來為大家開門，身後跟着一條狗狗，狗狗不動聲，搖一搖尾巴，呼一呼鼻子，也很歡喜的樣子。



我住的地方只隔着一條街……我說的是那條以他命名的街道。香港有許多以英國官員命名的街道。雖然人們對這些異國名字見怪不怪，但未必知道這些路牌隱含着權力與歷史的密碼。

大量以人名命名的街道是香港城市文化的一個特點，而在中國其他城市極少看到冠以人名的路牌，更看不到以英國人命名的街道。例如在北京，除了孫中山、張自忠等三位抗日英烈之外，再無以其他現代名人命名的街道，即使毛澤東、鄧小平也未享有這種殊榮。不以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街道名，這是毛澤東親自立下的規矩。在當年社會主義陣營的十幾個國家中，中國是唯一作出這樣規定的國家。今日在中國一些大城市中所見的「中山路」、「張自忠路」都是過去國民黨當政時留下的。

香港以人名命名街道是跟從英國的傳統。表面上看，這是表彰和紀念那些人的軍功政績，但其實還有更重要的功能：用這些符號來體現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力。最明顯的就是那些以英王、英國內閣大臣及港督命名的街道。

除了宣示權力之外，路牌還具有講述歷史的功能。例如那些以鴉片戰爭人物命名的街道，它們的名字可以連成長長的歷史文本，告訴我們英國殖民者如何來到香港：

「鴨巴甸街」是以英國政治家鴨巴甸四世伯爵命名。他的本名是喬治·漢密爾頓-戈登（George Hamilton-Gordon）。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他在卑利（Robert Peel）首相的內閣中擔任外相。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是在上屆政府——蘭姆（William Lamb）內閣的後期爆發的。卑利內閣上台後，便由漢密爾頓-戈登主導制定對華政策。他秉承前任外相亨利·坦普爾（Henry Temple）的「炮艦外交」，強迫清朝政府接受不平等的條約，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及割讓香港。

「士丹利街」是以作過三屆英國首相

百年樹人

小 冰

坐在羅校長舒適的家裏，大家興致勃勃地致意、問候、聊天。聊天，從回憶在培僑書院工作的日子開始。「書院令你們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方面呀？」燕首先向大家發問。

多年過去了，上級與下級，已經沒有了利益關係；工作做得好與不好，也都成為過去式，大家有啥說啥。我說：「如果培僑書院只是一所普通的學校，也就罷了，不必多說。但是這所中小學一條龍的學校，確實有很多與眾不同的方面。有些理念，旁人看起來簡直不可行，卻在那裏踐行得恰到好处。歷史短，卻一步一個腳印，邁得穩健。教師們教書思維靈活，學生們讀書讀得愉快。中文科使用的教科書，是內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這在香港僅此一家。」

陳越說：「多元化課程搞得很活。好比說，正視香港學生多族群、多文化的背景，為他們量身定製學習需求。一些有特質的學生，就是衝着這一點來培僑書院的。對於差生，不在乎他們成績高低，只在乎『你進步了』！」這時文峰接過話題：「記得有兩個『很笨』的學生，所謂讀書不夠好，樣子不夠可愛，性格不夠乖巧，轉學來到培僑。結果一來，欸！如魚得水，找到了自己的空間。」

隱含在路牌上的密碼

方 元



◀香港的路牌見證着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故事 作者供圖

的愛德華·史密斯—士丹利（Edward Smith-Stanley）命名。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他在卑利內閣擔任殖民地大臣時，正值在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他是負責中英談判具體事務的內閣官員。據說他對佔領香港的意義以及香港的前途一直存有疑慮。可能因為這個因素，他力主把香港建成貿易自由港。

「歌賦街」與詩歌詞賦無關，而是英軍將領休·歌賦（Hugh Gough）的名字。他原是駐印度麥索爾的英軍司令。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他被調來擔任英軍總指揮，取代作戰不利的懿律（George Elliot）少將。香港的歌賦山和「歌賦山道」也是以他的姓氏命名。

「砵甸乍街」是以第一任香港總督亨利·砵甸乍（Henry Pottinger）命名，本地華人則習慣稱它「石板街」。砵甸乍原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官員。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他被任命為英方的全權公使，赴南京與道光皇帝的欽差大臣耆英進行談判，代表英國在《南京條約》上簽字。戰後他被任命為第一任港督，但只做了一年便因政見不合而被調離香港。

「卑路乍街」是以英國海軍軍官愛德華·卑路乍（Edward Belche）命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他作為「硫磺號」（HMS Sulphur）的船長，參加了攻打廣州、舟山等地的戰役。在《南京條約》簽字之前，卑路乍迫不及待、搶先率領英軍在香港登陸，宣示英國正式佔領這個小島。此後，他又趁機對中國沿海水域進行了勘

測。「伊利近街」是以英國政治家伊利近八世伯爵命名。他的本名是詹姆斯·布魯斯（James Bruce），作過北美總督、加拿大總督。在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他被派往中國，擔任英方的全權談判代表。即是他當年下令英軍搶掠及焚燒北京「圓明園」，並迫使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割讓給英國。

布魯斯的頂頭上司正是那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在蘭姆內閣任外相的亨利·坦普爾。此時他作了內閣首相。香港的歷史學者通常叫他「巴麥尊」（Palmerston）。其實這不是本名，而是他的貴族稱號——巴麥尊子爵。他不是唯一享有此稱號的人，前後共有四個「巴麥尊」，而他是第三代子爵。坦普爾作過三屆外相和兩屆首相，因強硬推行「炮艦外交」而惡名昭著。他對十九世紀的中英關係有重要的影響，是兩次掀起鴉片戰爭的禍首。

所以，這些路牌既是權力的隱喻，也是歷史的見證。雖然鴉片戰爭的確煙早已散去，但歷史留下的印記每日可見。不過，現在許多人都未必了解這些街道與香港歷史的關係，即使每天與這些歷史人物同行，也視而不見。實際上，香港在歷史教育方面長期存在「失憶」的問題，而這正是造成今日青年人身份困惑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香港回歸二十年之後，我們應該怎樣重新講述香港的故事，這仍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等等，不用進門，望門就能知院是什麼院？房是什麼房？園是什麼園？門前是什麼、門後是什麼，門上是什麼，門下是什麼，俱有講究。甚至門門有典故，門門有詩句。精工細作，皆在門上。門若寒，其家必窮；門若闊，其家必豪，也有新解，土豪家的門故稱豪門。我去參觀過山西靈石縣的王家大院，六十多道門，門門不同，門門都有不同的風格，門飾都有鮮明的寓意，真乃窮天下之智，搜古今之意，門上有學問。門就是一本書，有時是本讀不懂的書。和尚出家，要稱遁入空門，何來空門？難道門中有風？無風何稱門風？且門風分好壞，門風分清濁。門內有人，皆為徒乎？否則何稱門生門徒乎？真可謂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又延生出門第、門閥，一個門裏走出多少千事萬意，一腳門裏，一腳門外，說不盡的中國門……

（下）